

## 第一章 民族团结抗日的号角（上）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的事变，开始了变中国为日本殖民地的阶段……日本帝国主义者已经显示他们要向中国本部前进了，他们要占领全中国。现在是日本帝国主义要把整个中国从几个帝国主义国家都有份的半殖民地状态改变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状态……威胁到了全国人民的生存。这种情形，就给中国一切阶级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怎么办”的问题。反抗呢？还是投降呢？或者游移于两者之间呢？

——毛泽东

九一八事变后，随着中日矛盾的不断上升，将各民族、各政党、各阶级团结起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谋救国大业成为当务之急。周恩来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直接领导了西北局部统一战线的工作，为建立以红军、东北军、西北军为一体的西北局部抗日统一战线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 一、九一八事变爆发，中日民族矛盾上升

1931年，正当国民党与共产党双方调动自己的军队进行“围剿”与反“围剿”的内战时，日本帝国主义经过精心策划，对中国发动了蓄谋已久的侵华事变。9月18日夜，日本驻中国东北的集团军——关东军——自行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然后贼喊捉贼，反诬中国军队——东北军——破坏铁路。以此为借口，关东军派兵突然袭击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

在蒋介石和东北军总司令张学良的“不抵抗”的命令下，尽管有一部分官兵违抗蒋介石的意志，奋起进行了零星的抵抗，但无济于事，根本阻止不了侵略者进攻的脚步。一夜之间，日军占领沈阳城并向东北其他地方发起了进攻。在“不抵抗”政策的扼制下，留守东北的十几万东北军面对只有一万多人的关东军束手无策，眼睁睁地看着东北沦陷。9月底，辽宁（不包括辽西）、吉林两省沦陷；11月，日军再占黑龙江省大部分地区。1932年2月，黑龙江全省沦陷。至此，整个东北100多万平方公里的大好河山沦为日本侵略者的殖民地，三千万同胞生活在日军的铁蹄之下。

这就是著名的九一八事变。

这就是让中国人永生不会忘记的九一八事变。

日军大规模地入侵中国使中国各阶层受到了强烈的震动。各阶层人士对国民党政府的屈膝退让政策无不义愤填膺，自发地掀起了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

此时，中央红军正进行着激烈的抗击国民党军队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大规模“围剿”战争。

九一八事变后，中共中央和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1931年11月宣告成立）多次发表宣言，号召中国工农红军和被压迫民族“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全中国工农士兵劳苦民众”拥护反帝运动的唯一领导者中国共产党“，必须坚决一致在争取工农革命胜利自求解放的利益之下，实行反帝国主义反国民党的斗争”。文件提出：党在九一八事变后要“大胆警醒民众的民族自觉”。但是，由于此时国民党正调集30万重兵对中央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围剿”，特别是中共临时中央的领导人深受共产国际的影响，把日本发动的九一八事变看做反苏战争的前兆，认为“目前帝国主义反苏联战争的危险是最主要的危险”九一八事变“是最露骨的反苏联战争的序幕”，视而不见日本的侵略在中国国内引起的社会阶级的新变化，否认民族资产阶级为主体的中间

势力的抗日要求，否认国民党内部在抗日问题上正在发生的变化，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的敌人，应该以主要的力量来打击这些妥协的反革命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尽管临时中央提出了建立抗日统一战线的问题，但是所谓的“统一战线”是排斥一切上层分子、排斥一切中间势力，只要“兵”不要“官”的所谓下层群众的统一战线。临时中央没有把政策的重点放在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和发展革命力量上来，而是片面强调国民党政权与苏维埃政权的对立，认为“国民党统治的崩溃，正在加速的进行着”，红军和苏维埃会立即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临时中央还由此断定：“目前中国政治形势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与革命的决死的斗争。”<sup>①</sup>周恩来作为临时中央领导集体的一名成员，其思想明显地受到了“左”倾关门主义的掣肘。1931年12月底，他由上海来到中央苏区首府瑞金，就任苏区中央局书记。由于中央苏区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军事上如何打破蒋介石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周恩来到达苏区后的主要任务是与毛泽东、朱德一起指挥中央红军进行反“围剿”战争，并领导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使中央根据地与闽浙赣根据地连成一片。1933年8月，移师福建“剿共”、曾在上海英勇抗击日军的第十九路军，派旅法时曾同周恩来在一起的吴明（陈公培）作为代表到福建延平前线，与红军联络，要求进行共同合作，抗日反蒋。周恩来对此十分重视。9月22日，他致电中革军委代理主席项英，红三军团司令员彭德怀、政委滕代远，建议派军团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在福建西芹地区与吴明进行会谈，以进一步了解他们的真实意图。经过会谈，红军与十九路军在前线进入了休战状态。10月26日，双方在弄清各自的真实意图后，在江西瑞金签订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与福建政府及十九路军反

<sup>①</sup> 《由于工农红军冲破第三次“围剿”及革命危机逐渐成熟而产生的党的紧急任务》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7）中央党校出版社 1983年12月出版

日反蒋的初步协定》：立即停止双方间的相互敌对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恢复商品贸易，解除对苏区的经济封锁，双方互派常驻代表。之后，双方又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中央红军与十九路军停止了双方的敌对军事行动，确定了边界，恢复了交通贸易。其后，十九路军从福建往中央根据地运送了大量的食盐、布匹、药品、军械等物资，部分解除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经济封锁。十九路军是“剿共”的一支强敌 协议签订后 红军与十九路军化敌为友 如果配合得当 将会给红军正在进行的第五次“反围剿”以有力的支持。但是结果却不是这样。

1933年11月20日 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济深等领导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 公开宣布反蒋抗日。24日，周恩来与朱德向赣东北根据地的刘畴西、曾洪易、寻淮洲发出指示，要求赣东北红军借十九路军抗日反蒋、蒋介石调兵向浙赣边境集中之际，开展游击战，截击敌人的联络运输，扰乱其后方。同一天，周恩来还向中共中央建议：以中央红军第三、第五军团侧击进攻福建的蒋介石军队，支持十九路军的反蒋抗日活动。中共临时中央继续执行“左”倾关门主义政策，对福建人民政府抱着完全不信任的态度而不予支援。周恩来的建议未被采纳。不过，客观地讲，即使周恩来的建设被采纳，其主要效果只是求得与十九路军的协同，减轻中央红军反第五次“围剿”和十九路军抗击蒋介石的压力，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共中央此时无暇采取实际措施，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问题。

在蒋介石优势兵力的进攻下，缺乏支援的十九路军失败了，福建人民政府流产。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战争，因蒋介石重兵进攻，在“左”倾中央的领导下 中央红军放弃了前几次反“围剿”战争中行之有效的积极防御方针，采取军事上的冒险主义方针，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即要求红军到根据地以外战胜敌人，在军事上同

国民党军打正规战、阵地战、堡垒战，同敌人拼消耗，还提出要争取苏维埃在全国的胜利。外无支援，主动要求联合红军的十九路军被临时中央拒之门外。第五次反“围剿”战争陷入了空前的被动与不利局面。到1934年10月，国民党军队已推进到了中央根据地腹地。兴国、宁都、石城相继失守。中共临时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

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明目张胆地要把整个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的开始。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了。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不断深入，特别是华北事变后，因一二九运动而起的全国性抗日救亡浪潮此起彼伏，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已经成为一个紧迫而现实的问题。1935年1月，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在贵州遵义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的会议——遵义会议。会议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中央的统治，重新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从危机中挽救了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共产党。同年10月，中共中央到达陕甘根据地吴起镇，历时一年的战略转移胜利结束。这为中共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陕北局势和全国的抗日浪潮使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从此，改变了中国的面貌，也改变了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地位。周恩来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过程中起了巨大的作用。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倡导者和推动者。

## 二、瓦窑堡会议：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的制定

中共中央真正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在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

中共中央率中央红军进行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没有像蒋介石希望的那样成为“石达开第二”。中共中央胜利到达陕

北后，仍然面临严峻的形势：蒋介石必欲置红军于死地而后快。中央红军身处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的包围之中。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必须寻找出路，摆脱包围。同时，在中国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到来之际，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从土地革命向民族革命战争转变的新形势。

瓦窑堡会议为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找到了光明之路，为中国共产党在将要到来的新的历史时期掌握了政治上的充分主动权，成为中国共产党从国内战争转向民族革命战争的重要起点。

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是与下面这些因素分不开的。

第一，遵义会议为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提供了可靠的政治和组织保证。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摒弃了“左”倾中央的关门主义和把中间势力当作最危险敌人的错误，这为客观分析自九一八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出现的新变化打下了基础。

第二，华北事变和随后发生的一二九运动使中共中央更加清楚地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侵略意图，对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潮有了直观的认识。在中共中央率领中央红军北上到达陕北前夕，日本军国主义者利用国民党统治者的不抵抗政策，加紧了对华北的掠夺。1935年6月初，日军胁迫国民党政府签订了《何梅协定》迫使国民党中央军撤出平、津两市和河北省接着又策动华北五省（山西、山东、河北、绥远、察哈尔）自治运动；11月又唆使汉奸殷汝耕割据冀东22个县，在河北通县成立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日军的压力下，12月，国民党准备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实行华北特殊化。

中国人民长期被压抑的愤怒情绪再也阻挡不住了。

地处前沿的华北人民，对日本军国主义者的步步侵略和国民党政府的不断妥协退让，感受最为深刻，反应最为强烈。在国民党北平冀察政务委员会即将宣布成立的时候，华北人民深感华北沦

陷已迫在眉睫。身处北平、天津的青年学生对于时局的演变，尤为敏感和关切。他们悲愤地喊出：“华北之大，已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在中共北平地下党的领导和影响下，1935年11月1日，北平、天津10余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联名发表了《为抗日救国自由宣言》。12月6日，北平15所大中学校的学生自治会发表《北平各校通电》，强烈谴责国民党蒋介石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的妥协投降政策，痛陈当今之中国“惟有动员全国抵抗之一途”。9日，北平大中学校的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日救国游行请愿示威活动，要求国民党当局公开宣布对日交涉经过，停止内战，反对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16日，在冀察政务委员会准备成立的日子，北平城内外的中大中学生与市民举行了规模比9日更大的示威游行，迫使国民党当局宣布延期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在北平学生运动影响下，全国各地的人民纷纷行动起来，抗议国民党对日妥协和镇压抗日运动，支援北平学生的斗争。学生起来了！工人起来了！文化界起来了！海外侨胞和留学国外的学生团体起来了！一场局部地区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就扩展为全国性的群众运动。

这场史称一二九运动的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毛泽东评价一二九运动“是抗战动员的运动，是准备思想和干部的运动，是动员全民族的运动”。一二九运动所掀起的全国性的救亡浪潮对中共中央的政策调整，无疑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第三，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指示为中共中央制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指明了方向。1935年7月，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大会鉴于法西斯势力在世界范围内日益猖獗的形势，向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要求。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出席了这次代表大会。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著名的“八一宣言”）。八一宣言分析了中国因日

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所造成的紧迫形势，呼吁全国各党派、各军队、各界同胞，不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的不同，有任何敌对行动，都应当停止内战，集中一切国力去为抗日而奋斗。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到达陕北瓦窑堡，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七大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于是，中共中央于11月13日，发表了《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中国宣言》。宣言指出：华北事变表明日本“不但要并吞整个华北，而且要把全中国变为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地”，提出“全中国的民众们！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们的出路，只有坚决的武装起来，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与打倒卖国贼首领蒋介石国民党的革命战争，以保卫华北和保卫中国以争取中国民族的最后解放”。28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了和八一宣言内容基本相同的《抗日救国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抗日反蒋。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遵义会议是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的政治基础和组织保障，一二九运动的影响、共产国际的指示是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的决定性因素。

然而，陕北局部面临的军事环境也是中共中央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不得不考虑的现实问题。直罗镇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队对陕北根据地发动的第三次军事“围剿”，边区的局面初步稳定下来。但“围剿”红军的东北军人数众多，是红军的主要对手。东北军是蒋介石“围剿”陕北红军的主力，也是一支有着强烈抗日要求的部队。如何对待东北军的抗日要求，与之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巩固并扩大苏区必须认真考虑和正确解决的十分现实的问题。

在上述背景下，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李维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林育英）、邓

颖超、吴亮平、郭洪涛等人出席或列席了会议。会议确定要“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的作战力量”。在会上，毛泽东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是一个具有两重性的阶级，是可以争取的力量。会议在 25 日通过了由洛甫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明确指出中国“目前政治形势已经起了一个基本上的变化，在中国革命史上划分了一个新时期，这表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变中国为殖民地，中国革命准备进入全国性的大革命”中国国内“在反革命营垒中是新的动摇、分裂与冲突。一部分民族资产阶级，许多的乡村富农与小地主，甚至一部分军阀，对于目前开始的新的民族运动，是有采取同情中立以至参加的可能的。民族革命战线是扩大了”。决议规定了“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决议还认为，“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最广泛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不仅应当是下层的，而且应当是包括上层的。会后，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中，特别分析了在日本要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情况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变化，强调指出“不仅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要求起来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民族资产阶级也有参加抗日的可能性。就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也不是铁板一块，由于他们分属于不同的帝国主义国家，他们当中依附英美的利益集团也是可能按照其主子的叱责声，“同日本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暗斗以至明争的”<sup>①</sup>。至此，建立一个包括中国一切抗日势力反对当前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就确立下来了。中国共产党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了积极的工作。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编：《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 148 页，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第一版。

周恩来对瓦窑堡会议的精髓心领神会。1936年1月2日他在政治局会议上作了题为《新的形势下党的组织任务》的报告，开宗明义指出：整个政治形势中心问题是开展民族战争，党的组织任务是团结领导千千万万群众在党的周围，进行民族革命战争。他要求：有抗日斗争的地方，就应有共产党的领导存在；没有抗日斗争的地方，共产党人也应当去发动和推动群众性的民族革命战争。共产党人要无孔不入地去发动和推动民族战争。

三、张学良：“现实使我感觉一切全不对头。”

瓦窑堡会议后，中共中央加强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工作，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积极促进一二九运动后全国人民日益高涨的抗日救亡浪潮；二是向国民党上层领导人和军队将领宣传中共的抗日主张，积极争取抗日的同盟者。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的领导下，西北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很快形成，为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做了直接的准备。

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首先在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中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东北军是当时国民党军队在陕甘根据地“围剿”红军的主力。能否在东北军问题上取得突破，是中共中央考虑的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为此，瓦窑堡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军工作委员会，由周恩来任书记，统一领导和部署对东北军的统战工作。

东北军是北洋军阀的一支——奉系军阀张作霖统帅的部队，原称“奉军”。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张学良继承父位，成为东北军新的统帅。张学良为了“奉还大政于中央，立致富强”（张学良语）率东北军于12月29日宣誓易帜，接受南京国民党中央政府的领导，由此结束了一个旧时代——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也标志着蒋介石政权对全中国统治名义上的统一。张学良被任命为“东北军政委员会”主任委员，所属部队被改为东北边防军，张学良出任总司令。1930年，因张学良派

兵武力调停中原大战，被蒋介石提升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总司令，接管华北军政，取得冀、察、晋、绥四省及平、津、青岛三市的实权，成为全国最大的地方实力派，成为位高权重的显赫人物。此时，年轻的张学良显然没有意识到一场蓄谋已久的战争正在向他逼近。

1931年9月18日夜晚，日本驻中国东北的侵略军——关东军——自己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铁轨，然后诬蔑中国军队破坏铁路，突袭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翌日即占领沈阳。短短几个月之内，东北三省百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落入日本侵略者之手，三千万同胞被迫流离失所、背井离乡。

日本关东军是侵入中国的豺狼！现在，狼不仅强行进入我们的家门，还杀气腾腾向我们扑来。驻守关内关外、共有36万之众的东北军面对只有1万人的关东军这只越来越疯狂的“狼”却表现得心慈手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家园沦为侵略军的乐土。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学术界有多种说法：一种是“愚忠”说，有人认为，是张学良对蒋介石的盲目服从和对关东军防御的松懈导致了这一后果<sup>①</sup>。一种是“保存实力说”，有学者认为，在中原大战后获得巨大利益的张学良，面临着是将军队撤回东北防御日本，还是留在关内保障这些利益的选择。张学良选择了后者。登上权力高峰的张学良，在踌躇满志之后，过着追欢逐乐、纸醉金迷的荒诞生活。九一八事变发生，张学良面临的是牺牲东北军保卫国家利益，还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保存东北军实力的重大抉择。身体、精神、意志的糟糕状况已使他丧失了正确判断事物的能力。保存东北军的实力，已成为他在九一八事变发生时的第一信念<sup>②</sup>。

王海晨、胡玉海著：《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第384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sup>②</sup> 刘国华：《论张学良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历程》，《安徽史学》1996年第1期。

但上述观点似乎忽略了另外一个重要原因，这就是张学良本人对日本人行为的错误判断。这一判断不是我们以往所说的他对国际联盟的错误判断，而是指他对日本帝国主义入侵中国的错误判断。九一八事变前，日本关东军曾多次在东北及东北边境制造事端，如中村大尉事件、万宝山事件等，企图挑起更大规模的冲突。蒋介石政府和张学良本人始终把这些事端当做局部的冲突来处理，把事端的出现当作日本关东军内部少数极端分子的行为，与日本政府没有关系。因此，当九一八事变的消息传来时，他在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日本人图谋东北由来已久这次挑衅的举动，来势很大，可能兴起大的战争……总结这次事件，勿使事态扩大以免兵连祸结波及全国。”<sup>①</sup>从张学良的讲话中，我们不难看出他的思想：了解日本人的图谋，九一八事变有可能酿成“大的战争”但还是局部事件不是日本政府的行为关东军的行为会受到日本政府的约束。因此，不希望事态扩大，殃及全国。他仍然希望继续采取忍让的办法，以求得事态的平息。在事变过去50年后，张学良接受日本NHK电视台采访时，剖析了他当时的想法：“当时我想日本政府会控制（九一八事变——引者）因为他这样做违犯了国际公约，惹起了国际问题。”<sup>②</sup>“我判断日本不能这么做，因为这么做对他不利，我这个人胆大妄为的。我真知道日本人要政变，我当时可能跟日本人要拼的。”<sup>③</sup>然而，事与愿违。日本政府出面干涉关东军的行动，国际联盟向日本施压，重演甲午战争后俄、德、法三国干涉日本归还中国因签订《马关条约》被迫割

<sup>①</sup> 王海晨、胡玉海著：《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第385页，广东人民出版社2001年出版。

<sup>②</sup> 日本NHK记者专访录：《缄默50余年——张学良开口说话》第78页，辽宁人民出版社1991年出版。

<sup>③</sup> 周毅、苑红主编：《张学良文集》第1155页，香港中国市场经济出版社1991年出版。

让的辽东半岛的旧梦，等等，都没有出现。日本关东军对东北的步步紧逼以及国际联盟的偏袒，使张学良原先的期待成了黄粱美梦。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 张学良采取‘不抵抗政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既有蒋介石的‘不抵抗’的指令下达后 张学良对蒋介石盲目服从的‘愚忠’也有不愿拿东北军作牺牲品的小算盘 还有对日本帝国主义者入侵中国图谋的判断失误而希望求得不扩大九一八事变的错误处置。张学良的错误认识和小算盘在前，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在后，其与张学良处置日本人挑起事端的想法不谋而合，最后导致了中国人都不愿看到的结果，也是张学良本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张学良统帅的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不进行抵抗的结果，是让日本关东军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东北三省。政治上张学良相对独立、雄霸一方的局面不复存在，这是他没有想到的。还有许多事情也是他没有想到的：个人家产损失惨重，东北军几万兵力溃散，地盘的丧失导致入关的东北军的军饷只能依赖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经济上的依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依附。更让张学良没有想到的是 他从此背上了‘不抵抗将军’的骂名 成为其个人历史上耻辱的一页。张学良在九一八事变的处置上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张学良自言：“守土无状 万死不足以蔽辜” 丢失东北自然得付出代价 他请求辞去陆海空副总司令一职。蒋介石的国民政府也爽快，立即照准，改任其为北平绥靖公署主任。1933年1月初，日军进攻山海关，热河危急。已经背负丢失东北之责的张学良不愿再背骂名，积极准备抵抗。哪知道，蒋介石国民政府表面上积极，实际却敷衍了事，结果所谓的热河抗战只不过是虚张声势，孤立无援的东北军再次大败，热河全省沦陷。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又一次受到一致谴责。他只得再次请辞。

热河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张学良欲一洗“不抵抗将军”骂名的重大努力 他想与日军决一死战 守住热河 保住河北。然而 良

好的愿望与实际的结果再一次背道而驰。热河失守后，张学良不得不自请辞职。客观地讲，热河抗战的失利，责任不全在张学良。他主动请辞还有一层含义：寄希望于蒋介石的挽留，以便重整旗鼓，率部反击日军。发出请辞电后，他还对身边的人讲：“我要亲自率领刘多荃精锐的部队和全部东北军，与日寇一拼，誓死收复热河。”可是，张学良斗不过精明的蒋介石。后者没有满足张学良的愿望。在张学良发出正式辞职通电的第二天，国民政府发布命令：北平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代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呈请辞职，应即准免职；特派军政部长何应钦兼代执行军事委员会北平军分会委员长职权。

九一八事变后，不到两年时间，张学良从声名显赫的陆海空副总司令一下子降为普通老百姓，用张学良自己的话说：“现系平民了”。张学良的职位的急剧变化开创了一个先例：“拥众十数万之大军领袖，经保定车中一席谈，居然放下兵权，自请摆脱，又不可谓非中国军界之一创例也。”<sup>①</sup> 1933年4月，下野的张学良一行赴欧洲考察。他先后考察了意大利、英国、德国、芬兰 历时7个月。在欧洲，张学良戒掉了鸦片烟瘾，却在政治上染上了法西斯主义的毒素，崇拜墨索里尼和法西斯主义。回国后，张学良决心拥护“中国的墨索里尼”。他认为，中国事情搞不好的原因就在于政出多门，全国要不愿做亡国奴，就要大彻大悟，拥护一个领袖，并在公开场合宣传法西斯主义，特别是对身边的将校大谈法西斯主义的好处，认为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的意大利是“中国可效法的榜样。”<sup>②</sup> 法西斯主义成为以后他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秘密会谈的内容之一。

张学良毕竟是蒋介石可以反复使用的一枚棋子。他回国后不

天津《大公报》社评：《行矣张汉卿》1933年3月13日。

何柱国、刘海波：《西安事变内幕》，转引自《世纪情怀——张学良全传》第466

久就被任命为豫鄂皖三省“剿匪”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总司令是蒋介石）职务，走上了与红军直接对抗的前线。为了让东北军将士安心“剿匪”，他遵循蒋介石的说法，大谈共产党“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说什么：“中国破坏至此，‘赤匪’应当负最大的责任……我们再也不能忍受‘共匪’这样破坏中国了。无论‘共匪’口头上是怎样说的，可是他们的一切行为，客观上都是在为帝国主义造机会，使帝国主义更能侵略我们，压迫我们，我们现在不能允许共产党这样为帝国主义造机会，所以，我们应当‘剿匪’。”对于东北军将士中一些人不理解不打日本鬼子却打中国人的想法，张学良这样进行解释：“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到了万分危急的时期，内忧外患，重重逼来，大家再不努力，马上就有亡国灭种的可能。不过今日惟一先决的问题，是在安内，能安内，才能产生一个健全统一的政府，有了健全统一的政府，才能攘外，才能谈到收复失地，而安内的最重要工作，便是消灭赤匪。”<sup>①</sup> 张学良的这番训词，既是对蒋介石攻击共产党惯用语言的继承，也是与他崇拜法西斯主义、拥护“中国的墨索里尼”的思想一脉相承的。

在与红军的内战中，东北军被红二十五军整连整营地“吃掉”。张学良出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期间，尽管东北军在战场上没有捞到多少便宜，但他本人却从这时开始研究共产党，接触共产党人和共产主义的书籍。黎天才、潘文郁两人对张学良起了重要影响。黎天才原是共产党人，曾在李大钊烈士牺牲后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北平分会代理主席、中共北平市委书记等要职。1927年秋被张作霖逮捕，投靠奉系。张学良易帜时，黎为其撰写了《易帜后的东北党务计划》，得到张学良的赏识。张出任豫鄂皖“剿匪”副总司令后，黎被任命为上校机要处长。潘文郁，中共秘密党员，早年留学苏联，回国后与黎天才同在中共北平市委工作。九一八

<sup>①</sup> 《武汉日报》，1934年6月6日第三版。

事变后与黎天才一起办《北方周刊》宣传抗日。潘因黎的推荐，认识了张学良。张非常赏识潘的才华，任命潘为“剿共”总司令部中校机要秘书。在黎的推荐下，还有一些共产党员或前共产党人在张学良身边工作，如吴雨铭、李希逸等。在潘文郁、黎天才等人的帮助下，武汉时期的张学良开始阅读《资本论》、《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共产主义ABC》、《辩证唯物主义》等著作。1935年初，因叛徒出卖，潘文郁被蒋介石钦定为囚犯，由张学良处死。黎天才因张学良力保，得以身免，后出任西北“剿总”司令部政训处副处长。这一时期，张学良与共产党人的接触和对共产主义书籍的初步涉猎，使他对共产党员的才干与人格都有了直接的了解，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了简单的涉及，这对他以后从拥蒋“剿共”向联共逼蒋抗日的转变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1934年11月，鄂豫皖根据地主力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于翌年9月到达陕北，与陕甘红军会师。1935年1月，蒋介石撤销豫鄂皖“剿总”，改为武昌行营，张学良改任行营主任。此时，突破蒋介石国民党大军围追堵截的中央红军正从四川、甘肃向陕北进发。为了继续“围剿”中央红军，10月2日，国民政府成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蒋介石亲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一职，总部设在西安，节制陕西、甘肃、青海、宁夏四省军政事宜。张学良率东北军再次进行了全军大移防，可干的差事却仍是苦差事——“围剿”红军，且这一次东北军面临的作战对象除了原鄂豫皖根据地的红二十五军外，还有一个强“敌”——中共中央直接领导的中央主力红军。张学良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了。

张学良大军西开，虽属不情愿之事，初到西北，他还是希望用“剿匪”的战绩来取悦于蒋介石。为了鼓舞士气，每当东北军开赴西北、途经西安时，他必定前去对士兵进行训话，反反复复谈的不外乎“只有首先消灭共产党，解除内乱，再联合友邦，才有巩固的力量抗日”等老调。这时张学良虽然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政

策产生了怀疑，但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弃对这一政策的执行，这就决定了张学良进入西北初期对红军的积极“进剿”政策。然而，好事难成。从1935年10月至年底，东北军近三个主力师先后被红二十五军和中央红军“吃掉”。这对张学良恰如晴天霹雳。此时的张学良如同受到伤害的孩子，急需得到抚慰。可他遭遇的却是一个接着一个的“伤心”事。第一，张学良向蒋介石请求给予东北军粮饷补充，非但没有得到补充，被红军消灭的两个师110、109师还被国民政府军政部下令撤销番号；第二，张学良请求给予阵亡的两位师长每人10万抚恤金，得到的答复是：“特恤碍难照准”。张学良对蒋介石的做法极为不满而又无可奈何，只好自嘲：“我张某人混得不值20万块钱了。”

不仅如此，东北军官兵对反共内战的不满也与日俱增。

本来，广大东北军将士在九一八事变后，拖家带口，背井离乡，跟随张学良南下“剿共”形同流浪。他们不愿意死在“剿共”前线，而愿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他们向张疾呼：“与其与共产党打仗被打死，不如与日寇去拼命。”110师、109师被歼灭后，死难官兵的家属齐集西安“剿总”门前，向张学良请愿，要求抚恤家属，停止“剿共”战争。如果说，东北军将士及死难家属的请愿对张学良的影响还不大，那么，他身边的一些“少壮派”军官对他潜移默化的影响则是深刻的。连续的作战失利及蒋介石政府对东北军的落井下石，让少壮派看到“剿共”前途无望，他们对张学良明确表示了自己的意见。张学良的秘书应德田即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应德田对张学良说：“东北军今天的失利，委员长会有所预料的，他深知会有这样的下场，这是极明显的。先‘剿共’而后攘外是委员长坚定不移的政策，可是他自己又剿得怎么样呢？进攻江西红军四年，前后五次投入兵力共达百余万，结果损兵折将，占了些什么便宜？红军还是红军，红军仍然存在。

“以往的教训，如不及早觉悟，固执坚持，东北军迟早会在‘剿